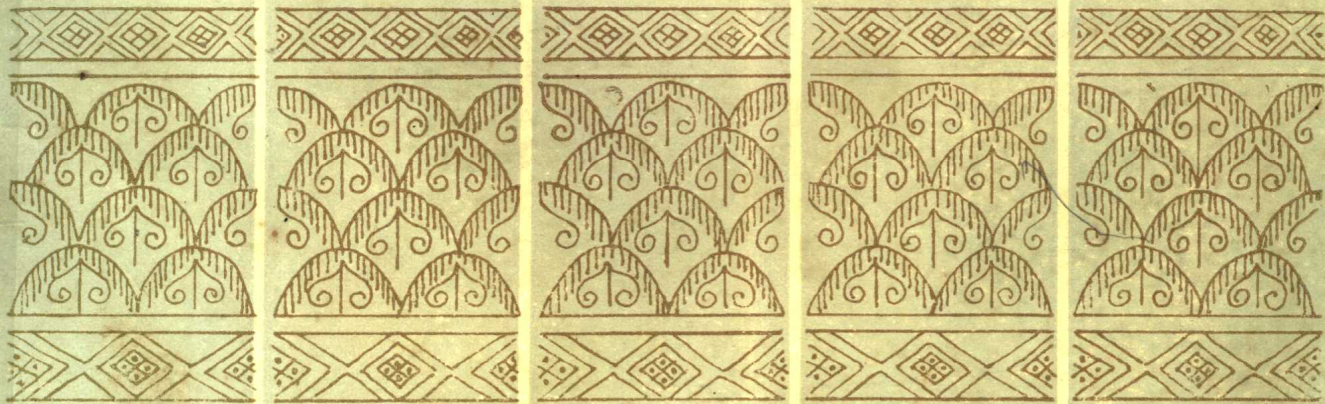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



音 韵 学 研 究

第 一 辑

中 国 音 韵 学 研 究 会 编

中 华 书 局

1984 年 · 北 京

音韵学研究

第一辑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4³/₄印张·746千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册

统一书号: 9018·131 定价: 3.20元

目 录

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纪要·····	大会秘书组 (1)
二、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	李新魁 (4)
三、《经典释文》反切考·····	王 力 (23)
四、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	周祖谟 (78)
五、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	严学宥 (92)
六、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	王 显 (131)
七、《史记》中的韵语·····	施向东 (156)
八、古汉语复辅音说质疑·····	刘又辛 (175)
九、用谐声关系拟测上古声母系统·····	喻世长 (182)
十、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	何九盈,陈复华 (207)
十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	张永言 (253)
十二、商代音系探索·····	赵 诚 (259)
十三、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	周长揖 (266)
十四、上古韵祭月是一个还是两个韵部·····	李毅夫 (286)
十五、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	史存直 (296)
十六、《广韵》的又读字·····	赵振铎 (314)
十七、《广韵》讹夺举正(增定稿)·····	葛信益 (330)
十八、释《集韵》的重出小韵·····	邵荣芬 (360)
十九、《中原音韵》无入声内证·····	忌 浮 (376)
二十、释《中原雅音》·····	龙 晦 (383)
二十一、汉语“知、章、庄、日”的八思巴字译音·····	杨耐思 (394)
二十二、等韵溯源·····	俞 敏 (402)
二十三、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说·····	李如龙 (414)
二十四、从“等”来看广州方言入声消失的迹象·····	黄家敦 (423)
二十五、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消失的历史·····	潘家懿 (429)
二十六、论入声·····	许宝华 (433)
二十七、说平声·····	邢公畹 (447)
二十八 论入声的性质·····	宗福邦 (455)
二十九、近代汉语介音的发展·····	李新魁 (471)
三十、现代汉语声母和日语音读(吴音,汉音)对应关系的研究·····	杨春霖,李怀塘 (485)
三十一、形声字读音类化现象探索·····	黎新第 (513)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讨论会,于1980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武汉市胜利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87人,列席代表及旁听者49人,共136人,既有白发斑斑的老专家,又有年富力强的中年音韵学工作者;既有国内的专家,又有港澳地区的学者。学者们济济一堂,齐集东湖之滨,兴高采烈地参加我国音韵学界的这一盛大活动。

早在1979年春,北京市和广州市的部分音韵学者提出倡议,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语言学研究的号召,团结国内和港澳地区的音韵学工作者,继承我国音韵学研究的优秀传统,推动音韵学研究的新发展,有必要成立一个音韵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一倡议,得到各单位领导的支持和各地学者的赞同。1979年下半年,成立了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经过互相介绍、推荐和本人申请,共有八十多人参加了本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湖北省委、湖北社会科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和四川省字典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终于顺利举行。

1980年10月29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典礼。会上,湖北省委文教部朱九思部长代表省委讲了话。他指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成立,是汉语音韵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盛举,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这次盛会是一次向繁荣音韵科学事业大进军的誓师大会。他向到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南民族学院白瑞西院长也向大会致了贺辞,祝贺大会胜利召开。

王力教授在会上发言。他说: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十分高兴。看到年老的和年青的音韵学工作者济济一堂,会聚在一起,共同交流研究心得、研探音韵学中的学术问题,感到我国的音韵学界大有希望。他着重地说明了音韵学的作用和重要性,指出掌握等韵学对研究音韵学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全国的音韵学者加强努力,促进团结,为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周祖谟教授也在会上发言。他说:“我能参加这次会议,得有机会向各位奉手求教,心里非常高兴。我们都会体会到学术的发展是在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下不断向前推进的。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还对音韵学研究的途径及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

音韵学研究会筹备组召集人严学窘教授在会上做了本会筹备经过的报告。他除了介绍本会筹备的过程之外,还着重指出:“由于我国传统语言学中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音韵学为三者的枢纽,历宋到清,研究硕果累累,举世瞩目。但自从音韵学遭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四人帮”的肆意践踏,至今几成绝学,学人凋零。可是,它是建立中国语言学的阶梯和基础,必须有所继承。现在为了抢救、扶植、发展和繁荣音韵学,有必要组织同行进行学术上的探讨

和交流,提供宣读论文的讲坛和出版论文的机会,通过互相学习、启发,不断深化,从而更好地在解决新旧问题中培养新一代”。他还介绍了本会会员的组织情况,并向支持本会建立的有关单位、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前来参加大会的三位香港学者表示欢迎。

会上,还宣读了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山西省语言学会、福建省语言学会、湖北省语言学会、武汉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给大会的贺信。

29日下午,举行学术报告会。首先由李新魁同志代表筹备组作了《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的发言。他概括地叙述了汉语音韵学研究的情况,着重介绍了三十年来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并对今后如何开展音韵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他指出:我国的前辈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巨大,但仍有许多薄弱环节,仍有许多新的领域等待我们去开拓,去做深入的研究。我们必须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我们希望经过这次大会,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音韵学研究,将会开出更加鲜艳夺目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李新魁发言之后,开始了论文宣讲。这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分为八个专题进行宣讲:一、上古音系;二、汉魏六朝音系;三、中古音系;四、近代音系;五、等韵;六、从民族语言研究音韵;七、从汉语方言研究音韵;八、理论及其他。这八个专题,从10月29日下午开始至11月2日上午,先后有四十多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论文,分别介绍了论文的主要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报告人中,有音韵学界中的老前辈和著名学者,也有中年的音韵学工作者,还有刚学习音韵不久的年青研究生。他们在报告中除了阐明自己的论点之外,有的还就别人的论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各人报告了论文要点之后,展开自由讨论。讨论中围绕着《切韵》音系的性质和上古汉语有没有复辅音以及韵图分等的理论和原则等问题热烈地发表了各自的见解。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论文很多,发的参考材料内容丰富多采,会上的发言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扬了学术民主,展示了良好的学风,讨论会开得很成功。有些老学者说:这次参加大会,收获很大,吸收许多新知。这次讨论会,是1956年以来所开的学术讨论会中最好的一次。许多年青的音韵学工作者也在发言中表示:这次参加大会,听到了前辈学者们的精辟见解,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東西,培养了研究音韵学的兴趣,增强了继续学习和钻研音韵学的信心。

除了各人报告了论文之外,著名学者邢公畹、王均、郭良夫、徐复等先生还就如何开展音韵学研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把传统的研究方法“考古”与新兴的研究方法“构拟”(审音)两大手段结合起来,既要继承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地利用书面材料,还必须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等活语言的材料来助成汉语音韵学的研究。

香港学者张双庆先生也在会上发言。他代表这次回国参加讨论会的三位香港学者发言说:这次得以参加大会,感到很高兴。在生活上得到朋友们的关怀照顾,参加大会的报告和讨论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收获很大。他表示:香港的学者乐意为音韵学研究会工作的开展、为联络海外的学术界、为提供学术资料等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1月2日上午,大会讨论了音韵学会的研究规划和活动计划,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项

目和研究重心主要是:

- 一、把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放在首位。
- 二、总结和普及新的研究成果,编写音韵学教科书。
- 三、进行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加强薄弱环节。
- 四、探讨当代的主要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
- 五、进行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填补音韵学领域的空白。
- 六、开展一些有开拓意义的新课题的研究。
- 七、开展形态音韵学、文艺音韵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
- 八、整理音韵学资料,编印工具书和音韵学典籍。

会上,还讨论了《音韵学研究》论文集的编辑方针和具体做法。

11月2日下午,大会进行选举。选举之前,由大会领导小组提议本会聘请国内外有影响的、年高德劭的著名学者王力、周祖谟两位先生为本会名誉会长。聘请学有专长的前辈学者丁声树、高元白、姜亮夫、陆宗达、启功、史存直、王静如、徐复、邢公畹、殷孟伦、张清常、张世禄十二位先生为本会顾问,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常宗豪、陈复华、葛信益、郭良夫、黄典诚、黄绮、蒋礼鸿、李格非、李新魁、梁德曼、刘又辛、鲁国尧、宁继福、邵荣芬、唐作藩、王均、王迈、王显、许宝华、严学窘、杨耐思、杨春霖、殷焕先、俞敏、喻世长、赵诚、赵振铎、朱星、宗福邦(共29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为本会理事,选举严学窘为本会会长,李新魁、邵荣芬、唐作藩、王显、(按音序排列)为副会长。选举赵诚为秘书长,梁德曼、许宝华、杨春霖、宗福邦为副秘书长。

11月2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本会会长严学窘先生致闭幕词。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充满了学术的气氛和求进的精神,开得很好,很成功,完满地完成了大会的各项任务:一是宣读并讨论了50篇论文,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二是审议并通过了章程和研究规划,作出了正确的决议;三是选举了办事机构人员,健全了研究会的体制。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中国音韵学界空前团结的一次盛会,标志着我国音韵学研究将会大大地向前跨进一步。它将鼓舞全国音韵学界同心同德地为实现音韵学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他表示,我们办事机构的人员,一定遵照代表们的嘱咐,努力工作,力求把研究会的事情办好,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全体会员同志对我们的希望和付托。

大会在通过《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次讨论会会议纪要》之后,宣布胜利闭幕。

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

李 新 魁

汉语音韵学是我国研究古汉语语音的传统学科,本属古代所谓“小学”的一个部门。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而“汉语音韵学”这个名称,却是比较后起的。

现在所称的“汉语音韵学”,包括了通常说的“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三个部分的内容。近年来,音韵学界有人还提出了以研究代表北方话语音的《中原音韵》音系为主要对象的“北音学”,再加上音韵学史和新兴的语音史的研究,可以说共有五个部分。

古音学是研究以《诗经》押韵为主要代表的上古音的;今音学(这是沿用明清时人的叫法)是研究以《切韵》《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的;等韵学是以等韵学理及等韵图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放后,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汉语语音史的系统研究,语音史当然也可以说是独立于音韵学之外的一个学科,但它与音韵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应该说,汉语语音史事实上也应属音韵学的一个部分。这样,汉语音韵学的研究范围,可以包含五个部分。现在,我们姑且就这五个部分谈谈它们研究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展望。

一、古音学的研究

古音学的研究,是我国学者开展最早、研究时间最久的一个部门。对上古时期音韵的研究,主要导源于宋代而发展于明代,到了清代,是古音研究鼎盛的历史时期。近几十年来对古音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则有新的进展并取得更加重要的成就。

唐宋之前,我国也有注意到古音情况的人,但没有做什么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完整的论著出现。真正可以称得上研究古音的,要首推宋代的吴棫。吴氏著有《韵补》、《毛诗补音》和《楚辞释音》等书。他的《韵补》主要是研究古韵通转的著作,它按照《广韵》的韵目把古代韵文的韵脚字统摄起来,在韵目之下注明“古通某”、“古转声通某”、“古通某或转入某”等字样,后人按照他所注的“通”和“转”对各类字加以归纳,大体上可以分为九类。它代表了最早的对古音韵部的区分。它的做法当然不够科学和完密,但作为一部古音学的发端性著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宋代继吴棫《韵补》之后,有程迥的《音式》和郑庠的《古音辨》,这两部书也是考求上古音的著作,但都亡佚。到了明代,研究古音的有杨慎、陈第等人,但是成绩比较显著的却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称得上是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奠基者,他差不多以毕生的精力研究音韵学,写成了《音学五书》,为后代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门径,提出了方法。他所分的古

韵十部,虽很粗略,但影响是巨大的。顾炎武以后,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等继续对古韵分部进行研究,分部愈来愈细密,正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顾氏的十部到江永的十三部,到段玉裁的十七部,孔广森的十八部,戴震的二十五部(入声独立分部),王念孙、江有诰的二十一部,分类越来越细,归部越来越接近精确。此外,严可均、张惠言、姚文田、刘逢禄、丁履恒、夏忻、朱骏声、黄以周等人也都提出过古韵分部的见解,但影响比不上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人。清代以后,古音学的研究到了章炳麟、黄侃手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章氏分古韵为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

古韵的分部,经过明清时代诸学者的不断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前人对古音的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一些地方表现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正如清人刘禧延所批评的那样,“古音自亭林顾氏大畅厥旨,后如慎修江氏、懋堂段氏分析诸部,递益严密。近诸考古家互有移并,然或过于求密,致失之拘。甚或古人用韵,有不合其部分者,辄略而弗言以曲全己说。始固由经典以求古音,究将执其所谓古音以局古人,此特自为一家之说,于古人未必尽合也”。(见《刘氏遗著》)这种观点和方法的局限性,使古音的研究成果受到一定的限制。

对明清时代的古音学家,有人将他们分为考古和审音两派。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章炳麟等人属于考古派,江永、戴震、刘逢禄、黄侃等人属于审音派。当然,考古派也懂得审音,审音派也不完全脱离考古,只是他们的研究方法各有侧重,考古派比较注意对上古史料作归纳,同时也利用音理来帮助说解;审音派则以近代流行的等韵学理及中古《切韵》、《广韵》一系韵书的音类区分来证明古音。

古音学家研究上古音,主要是分析《诗经》的韵部,间及其他上古时期的韵文材料。除此而外,他们还利用汉字的谐声偏旁来协助证明古韵的分类。顾炎武已懂得运用这一手段,但到段玉裁手中,才比较系统的用谐声材料来与古韵分部互相比证。段玉裁说的“凡同谐声者必同部”是他分析《诗经》韵部与谐声系统的关系之后提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不完全贴当,但他认识到谐声的分类与古韵的分部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应该说是他卓越的见解。

在顾炎武等人研究上古音时,他们还逐渐认识到运用中古韵书来研究古韵分部的重要性。上古时期没有韵书,古人作诗押韵,依据的是自然读音的和谐,没有成规可以依循。因此,分析上古时期的押韵系统,也即研究《诗经》、《楚辞》等的韵脚字分类,带有颇大的推测性。韵脚字的辨认是分部宽狭的一个关键问题。经常在一起押韵的字固然可以归为一类,而偶然相押的字该如何归类,这就大有争论的余地。段玉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合韵”和“通韵”的概念,这些“合韵”、“通韵”指的就是例外的押韵。例外押韵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可能,例外押韵的几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例外字互押存在的亲疏厚薄的关系如何,都必须加以考究和说明。戴震和孔广森等人提出的“阴阳对转”的理论,就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这种“合韵”字的关系的。

古韵分部的正例与例外,一方面当然有赖于对韵脚字的正确辨认,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结合谐声系统及其他方面的语音材料来考察,而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利用中古韵

书各个韵类划分的框框来范围古诗文的入韵字,以及补充入韵字过少或辨识例外现象,协助古韵的划分。这样,就把上古音的研究与对中古韵书的研究结合起来。顾炎武在研究上古音的分部时就利用了中古韵书的分部,但他又不为中古韵部所羁绊,他能离析中古韵书的韵类,以与上古韵类的区别相配合,这一点是顾氏的卓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明清时人眼中,中古韵书的部类划分,中古韵类本身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要研究的直接对象。他们原先只是把对中古韵书的分析和研究作为助成上古音研究的手段,没有对上古音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从研究上古音的角度来说,它们确实也离不开中古韵书的帮忙。在这一点上,古人的眼光倒是不错的。

因此,上古音的研究,本来是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韵类分析为重心的,但由于研究的不断深入,也促成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如对谐声系统的归纳与整理(清人写了许多关于谐声系统的著作),对《诗经》韵例的归纳、辨认,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这可以说是古音学研究对整个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明清时代对古音的研究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除了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时陷于主观唯心主义之外,在研究目的上也欠缺明确的、科学的目标。他们把研究对象主要地局限于古韵,特别是《诗经》的分部上,至于这些韵部的音值却较少注意。他们对某些韵部的实际读法虽有一些零碎的不成系统的见解,但往往是不正确的。例如,前人多有“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观念,这是不准确的。同时,明清时人对声类的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个别人(如钱大昕)比较留意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见解,但论证的方法仍有缺点。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他们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近几十年来,古音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音韵学界从主要着重音类的区分进而比较重视音值的拟构。瑞典学者高本汉首先系统地运用西洋语音学的原理和历史比较法以及音标这个工具对上古语音进行分析和拟构,进而上推古音,拟订出汉语上古时期的语音系统。其他的学者如伯希和、马伯乐等也有所发明。高本汉写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影响。高本汉对上古语音进行拟测的根据,主要是分析《广韵》的反切和调查汉语的方言,据此订出音类和拟出音值,他看出三等字所用的反切上字与一二四等的反切上字有分类的趋势,并认为三等字的声母是j化的。他以中古语音的分析,拟订为立足点,构拟出上古音的全貌。高氏的学说最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的音韵学界有相当大的推动力量。尽管高本汉的见解和结论有许多是不正确的(董同龢对他的做法上的缺点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但他所用的方法和工具,却为后来许多学者所运用,他所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

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经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的翻译之后,其科学性有更进一步地提高。高本汉除这部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有关上古音的研究性论著,如《汉语分析字典》、《上古汉语问题》、《诗经研究》、《汉语词类》、《中日汉字形声论》、《上古及中古汉语语音学简编》(或译《中国声韵学大纲》)等,论著繁富,贡献颇大。

在高本汉系统地拟构上古音系的差不多同时,有关上古音的各种问题也逐渐被提出来,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了讨论。先是俄国学者钢和泰写了《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揭示了利用梵文对音对拟构中国古音的用处,继而有汪荣宝写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运用梵文译经上的对音材料,提出歌戈韵并不读为 o,在唐朝时读为 a。他说:“读歌戈收 a 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 a 者,魏晋以上之音。”汪文出来以后,章炳麟、徐震、林语堂、唐钺、李思纯、洪瑞钊等人都写有文章提出补充或驳正的意见。这一讨论对于如何运用外语对音材料,开拓汉语音韵学研究、论证的领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汪荣宝的文章,提出了古音韵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此后,又有学者写文章,讨论了之脂支三部的分合问题(最近,黄绮先生也写了《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之是否应分为三》的文章,不同意段玉裁的意见),还对东冬部、哈德部、谈添部、鱼宵部、幽觉部等韵部的分合及音值发表了意见。在讨论上古音某些韵部的问题中,李方桂的《切韵 a 的来源》一文较为重要,他主要依据《诗经》押韵和谐声系统来证明《切韵》中的“重韵”主要是由上古的 a 和 ə 演变而来的,驳正了高本汉的意见。李方桂还写了其他一些文章跟高本汉讨论古音的问题。此外,西门华特的《论上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构拟》、罗常培的《切韵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魏建功的《古阴阳入三声考》、张清常的《中国上古 -b 声尾的遗迹》等文章,也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在古音韵类问题的研究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比较全面讨论古韵分部的,主要有王力先生写的《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等。王先生早年采用章炳麟晚年的主张,把冬部并入侵部,又主张脂、微分部,也分古韵为二十三部(他的二十三部与章氏的二十三部不完全相同),二十三部的分法是没有把阴、阳、入三分。后来,王力先生也主张阴、阳、入三分,把古韵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增加了之幽宵侯鱼支六部相应的入声,即职觉药屋铎锡六部。

解放以后,对上古韵类问题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期间,方孝岳先生写了《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和《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等文章,严学宥先生写了《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王力先生写了《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黄绮先生写了《关于上古汉语鼻音尾的问题》,黄典诚先生写了《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等文章,从不同方面研究了某些韵类的音类划分和音值拟构,有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有的则对某些研究理论加以阐发。

除韵类问题本身进行了研讨之外,与上古韵部的划分有密切关系的《诗经》及《楚辞》等重要韵文的韵例也有不少重要论著出现。数十年来,丁以此、李从云、陆志韦、赵天吏、董同龢、王力等人都有专文发表,其中陆志韦的《诗韵谱》、王力的《诗经韵读》、《楚辞韵读》是较为重要的论著。他们用构拟的上古音标出各个韵脚字的音读,这不但反映了研究者本人对韵脚字辨认的具体意见,也方便了一般读者对韵例的理解。对《诗经》韵例的分析,最近还有王显先生写的《〈诗经〉的韵例》一书,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在对上古韵文韵例的研讨中,董同龢的《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是一篇较为重要的文章,他针对高本汉在《老子韵考》等论文中提出的“自由押韵”的

主张提出不同的见解,同时也指出上古楚方言的一些语音特点。

在上古音声类方面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有比较明显的进展。首先是有人提出了古有复辅音的问题。英国人伊特金斯(Edkins)提出了这个见解之后,林语堂写了一篇《古有复辅音说》。高本汉在《汉语词类》一书中更进一步阐明古有复辅音。音韵学界中罗常培、陆志韦、李方桂、严学窘、周祖谟、董同龢、周法高诸人也都认为古有复辅音,严学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的研究精力,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复辅音系统。不过,这一问题在音韵学界中也有不同意见,唐兰、王力、朱星、徐德庵诸先生则不赞成古有复辅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其次是对上古音各个声母的分合关系及音值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自从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人多舌音”等见解以后,声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继夏燮《述韵》提出的“重唇轻唇合用证”,“舌头舌上半舌合用证”之后,又有章炳麟的《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刘赧的《“喻”、“邪”两组古读试探》、黄焯的《古音为纽归匣说》以及葛毅卿“喻三入匣”的文章。此外,周祖谟先生的《审母古音考》和《禅母古音考》、钱玄同的《古音无“邪”组证》、朱芳圃的《照穿神禅古读考》、裴学海的《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以及马汉麟的《古音审并于晓考证》等文章,也对中古照组各个声母在上古音中的分合及读法提出了论证。吴英华的《古音喉牙相通考》、蔡凤圻的《见溪变晓匣说》、《晓匣与影喻》、李新魁的《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张为纲的《透定晓匣古今音变迁考》和《明纽古音变转例证》等文章,则阐明了喉、牙音之间的分分合合以及与其他声纽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比较全面研讨上古音声母的,则是严学窘先生的《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这些文章提出了上古各个声母的分合或音读,有的文章论证充分,信而有微,可以视为定论;有的文章则提出了一些假说,论证手段还有缺陷,或是论证材料还不够充实,需要进一步探讨。最近张清常先生发表了《古音无轻唇舌上八音再证》,对论证古音分合的方法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总之,几十年来,对上古音声类的探讨是颇为活跃的,成绩也是可观的。

上古的声调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讨。清人段玉裁认为古无去声,王力先生基本上赞同此说。他认为从韵母的角度看,段氏所谓去入为一类是正确的。《广韵》里的去声字,大部分在上古都属入声。从调值来说,入声是个短促的调子,这是声调问题,段氏所谓古无去声则是不对的。王先生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一种是长入,到中古变为去声,一种是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他最近还发表了《古无去声例证》一文,从文献上钩稽古无去声的证据。黄侃认为古无上声,而杨树达却写了《诗音有上声说》。孔广森认为古无入声,这是他从自身方言无入声的情况提出的糊涂说法,方孝岳先生曾给予很中肯的批评。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只是古代四声不同于后代的四声。他的看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周祖谟先生写了《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论证了上古时实有四声。

上面所谈的是对上古音韵类、声类、调类各方面各别研究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论著是对上古音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探讨和拟构的。这些论著中,首先要提到的是陆志韦先生的《古音说略》。此书对上古音各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陆氏认为上古有复辅音,上古的k类跟t类声母都可以腭化,t类跟ts类声母大致不通转,上古的鼻音m、n、

ŋ 至少在某种方言里带破裂音, 即有 mp, mb, nt, nd, ŋk, ŋg 等音, 它们与 m, n, ŋ 不并存, 这些提法颇有启发性。董同龢的《上古音韵表稿》除了全面拟构了上古音的音值外, 主要是对先秦典籍出现的字加以拟音、归类, 标明其音读。董氏拟音的重要之点, 是提出有一个与 m 相对的清鼻音 ɱ, 它变为后代的晓母。另外, 他把中古的端、知组同拟为 t 组, 中古的照三组在上古音中一部分是读为 $\hat{t}$ ([t̪]) 组, 一部分读为 $\hat{k}$ ([c]) 组。他拟有一个与送气全浊音 d' 相对的 d, 它后代变为“喻四”。韵类方面, 主要的特点是上古音一、二等的不同, 主要是元音的不同(一等韵的主元音加[^]表示)。他拟的主元音有二十个。阴声韵除歌部外, 其余各韵都收 -g, -d, -r 尾, 如鱼为 ag, 脂为 ed。认为上古音中的介音有 j, i 之分, 变入中古三等韵的介音用 j, 四等用 i, 如支 jeg > je, 齐 ieg > iei。合口介音用一个 u。他认为四等韵在上古和中古都带有 i 介音, 对中古的重韵字, 将其在上古的主元音拟为不同的音, 如衔 am > am, 咸 em > em。董同龢在 1954 年出版了《中国语音史》, 后又补充为《汉语音韵学》, 在 1968 年出版。后两本书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论点, 但也有所发挥。董氏的表稿, 可以说既有理论上的价值, 又有实用上的价值。几十年来, 一些搞其他研究工作的, 要查考某个字的上古音读, 还常常要用到他的表。当然, 这个表里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但它确曾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 周法高仿照董同龢的作法, 也编了《上古音韵表》和《中古音韵表》。常宗豪和缪锦安也仿照这一形式, 把高本汉的拟音编为《中国上古音韵表》。周法高、张日升等, 还编了《汉字古今音汇》, 标明了各个汉字的上古、中古、现代及粤方言的读音。

在全面拟构上古音的学者中, 我们必须提到日本学者藤堂明保, 他的《中国语音韵论》也全面地拟测了汉语的上古音读。在声母方面, 他把全浊音拟为不送气音, 中古的端、知、章三组声母都拟为 t 等, 齿音精、庄同作 c 等, 另有三个“半母音” w, r, j。对韵类的拟测, 他定一、二等韵的主要元音相同, 只是在二等的主元音上加 v 号以作区别, 如哈 əg > əi, 皆 əg > əi, 豪 og > aw, 肴 ög > ew。四等韵在上古和中古都没有 i 介音, 而在上古的四等韵主元音上加一号表示, 如谈 am, 添 ām, 寒 an, 先 ān。四等韵的中古元音都作 e。对上古的所有韵母, 他都拟带有韵尾。除入声韵、阳声韵外, 阴声韵的韵尾有 -g, -d, -r, 没有开尾韵。混合三等韵他拟上一个 r, 四等韵则不加, 如祭开三 r-jad > r-jei, 祭开四 jad > jei, 一些在中古是独立的三等韵, 如微 rər > rai, 殷 rən > rən, 文 rwən > rwən, 废 räd > rāj 等, 加 r 表示, 但没有 j 介音。所有的合口介音都用 w 表示。对中古的重韵字, 其上古读音都拟为同音, 如删 ān > en, 山 ān > an。藤氏的拟构有些地方令人不容易接受。

王力先生在 1957 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的语音部分, 也提出了他对上古音的全面拟构。他订出声母六类三十二个。他把端、知组合拟为 t, 而照三组作 t̪, 照二组作舌叶音 t̪' 等, 喻四也作 d。韵类方面, 他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 它的要点是: 上古音在后来变入中古二等韵的字, 其拟音是开口加 e 韵头, 合口加 o 韵头, 如麻韵 ea > a, oa > wa, 他的主要元音系统较为复杂。主张元音有长短之分, 变入中古的入声韵, 其上古的主元音就是短元音, 加 v 号表示, 如麦 ěk > æk, 质 iět > iět。中古的三等韵其原来的介音用 ĩ 表示, 四等韵用 i 表示。上古的合口介音也有 u, w 两种, 一般是一、二等字用 u, 三等(非独立三等)、四等字用 w。对

冬部,他拟为-m尾的音,而对幽部、宵部,他拟为复元音,如加上韵头和韵尾,则有 cǎuk(觉)等的形式。

方孝岳先生著有《汉语语音史概要》一书,他分上古韵母为三十摄(部),他与王力先生拟音的不同,主要是主元音不作长短的区别,之部作 v,幽部作 u,鱼部作 ɒ,微部作 əi,不同意高本汉等人分塞音韵尾为两套。声类方面,方先生拟音的特点是认为声母有硬音与软音(j化)对立的两套音。声调方面,方先生认为阴声韵有两个调类,叫平、上,阳声韵也有平、上,入声也有两个调类,但调值很相近,后来其中某一个调类变成阴声韵的去声,另一调类保存了入声。方先生的拟音,一方面吸收了清人及近几十年来各方面音韵学者对音类划分、音值拟构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是十年来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他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在这篇论文中全面地提出他对上古音的新见解,好多问题的提法相当精当而富于启发性。他对上古的声母认为有一套圆唇的舌根音,有一套与浊鼻音相对的清鼻音(这是发展董同龢的说法),有相当丰富的复辅音;二等韵之中有使舌尖音卷舌化的 r 介音,有使舌尖音腭化的 j 介音,没有合口介音。他大大地简化了主要元音系统,定出 i、u、ə、a 四个,他认为同一韵部只能有一个元音,这就比高本汉于 1954 年拟为十四个,董同龢于 1944 年拟为二十个少得多。不主张韵尾有清塞音与浊塞音之分,认为韵尾除 m、n、ŋ、p、t、k 之外,还有 r,ŋw 和 kw(ŋw、kw 等是圆唇化的辅音韵尾,w 变为中古的 u,如宵、幽部就收此韵尾,而跟幽部相对的阳声韵则收 ŋw 尾。后来—1978 年,李方桂说 ŋw、kw 在中古以前就与 ŋ、k 合流了)。声调方面,他认为上古就有四声。李方桂的拟音有合理之处,但也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周法高对上古音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他的《论上古音》和《论上古音和切韵音》等论著上。他对上古的语音系统也作了全面的拟构。他在李方桂所拟的四个元音的基础上,再减为三个:ə、a、e。而介音却比较多,有 w(用于后来变为合口的字),r(用于后来变为二等韵的字上),j(用于后来的独立三等韵上),i(用于后来的混合三等韵即有重组的韵上),e(用于后来的纯四等韵上)。此外,r、w、j、i 都可以结合成复合介音。由于介音增多,主元音则减至最低限度。韵尾方面,周氏拟出-ɣ、-r、-w、-n、-ŋ、-wŋ、-m、-t、-k、-p、-wk 十一种韵尾。-ɣ 用于鱼部、之部、支部,-r 用于祭部、微部、脂部,-w 用于宵部、幽部、侯部,-n 用于元部、文部、真部,-ŋ 用于阳部、蒸部、耕部,-wŋ 用于中部、东部,-m 用于谈部、侵部,-t 用于月部、物部、质部,-k 用于铎部、职部、锡部,-p 用于叶部、缉部,-wk 用于药部、觉部、屋部。歌部没有收尾。共分古韵为三十一部。

声母方面,周法高把全浊音拟为不送气,匣组拟为 g,端、知组共作 t,照三组作 t(j)等。但船组作 zd(j)、书组作 st'(j)、禅组作 d(j);照二组作 ts(r)和 ts(j)两种,邪组作 r(j)、ɣr(j),喻四作 r(j)、ɣr(j)。另外还有许多复辅音。

李新魁的《汉语语音史》和《古音概说》对上古音的声、韵、调也作了全面的拟测,他认为上古音中没有介音,与现在的广州方言一样,但是声母比较丰富。除了一般的声母外,还有三种带特殊色彩的声母,在喉(牙)、唇音上(他主张上古音中喉、牙音不分),有单纯音(硬音)

与唇化音的区别,唇化音促成中古合口介音及某些二等韵的产生;在舌齿音上,有单纯音与卷舌化音的区别,卷舌化音促成中古知二组、照二组声母的出现;在各类声母上,都有单纯音(硬音)与舌面化音的区别,舌面化音促成中古三等韵*i*介音的产生。这种声母带有各种不同的特殊色彩,与现代的瑶语、景颇语相似。韵母方面,他分古韵为三十六部,一方面将歌部分为歌戈两部、月部分为曷月两部、寒部分为寒桓两部,即开合口分韵,而所谓合口,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分出一组“次入韵”祭、废、至、队四部,它们收喉塞音[ʔ]尾,这些韵部在魏晋之际从声调方面来说变为去声,从韵母方面来说,祭、废两部的字形成《切韵》的祭泰夬废四韵,至、队两部形成怪、未、至、队、霁等韵。一共增加了六部,共三十六部。一部之中,主要元音一般有两个,一是开口度较大,变为中古的一等韵(在唇化、卷舌化声母之后则变为中古的二等韵,在舌面化声母之后则变为中古的三等韵),一是开口度较小,变为中古的四等韵。声调方面,认为阴声韵有两类,相当于中古的平、上,阳声韵只有一类,相当于中古的平,入声韵有两类,一类是次入韵所读的,中古时变为去声,一类相当于中古的入声,合起来也可以说有四声,只是去声的出现稍迟。

总观上古音的研究,各家的观点和拟构的结果逐渐趋于一致,但仍有一些问题的看法有较大分歧,这主要是下述几个问题:

1. 古韵到底该分为多少部,一部之中的元音只能有一个还是可以有发音相近的几个,是否同部一定是主要元音相同,元音是否有长短或松紧之分。
2. 上古有没有介音,介音有多少。
3. 韵母的收音有没有-p, -t, -k 与 -b, -d, -g(阴声韵的收声)的对立,有没有别的收音如-r, -ɣ, -ŋw, -kw 等。
4. 有没有复辅音,复辅音结合的范围及规律如何。
5. 鼻音声母的实际音值如何,是否有清鼻音或鼻音与塞音的结合如 mb, nd, ŋg 等音。
6. 圆唇化、舌面化(腭化)、卷舌化声母分配的范围如何,是声母具有特别的色彩,还是介音的不同。
7. 上古音的声调到底有多少个,有没有去声,上声、入声的分类和音值如何。
8. 《诗经》中一些韵脚字具体辨认的差异。
9. 对谐声系统如何分析和掌握,对它们论证效能该如何估价。

以上谈的是对上古音研究现状的简单概括,至于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下述几点:

1. 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与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

2. 必须加强汉藏语系的对比研究,充分运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对汉藏语系各有关语言进行全面的、科学的比较研究,为古音的研究开拓新领域,提供新门径。

3. 必须对先秦的典籍进行全面的检核,进一步整理和利用经典异文、同音假借、训诂(包括声训)等材料,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为全面的证据。

4. 必须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比如上古诗文押韵的韵例,语音演变的规律性与例外现象的关系,谐声系统的谐声原则及可依赖程度,上古语言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通语、方言的差别如何掌握,等等。

二、今音学的研究

今音学主要以中古时期出现的韵书《切韵》、《广韵》及它们所代表的音系为研究对象,当然也包括中古时期其他语音材料(如《玉篇》、《经典释文》、《万象名义》、《说文》反切等)的分析研究。今音学的历史,如果从韵书自身的编撰算起,当然可以上溯至已知最早韵书《声类》(李登撰)出现的年代(魏代),或者以隋唐《切韵》产生的时期为起点,但是,从把中古韵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性活动来说,则主要是从明清开始。我们这种说法,是把分析和表现中古韵书的音韵体系的等韵图拿开来说的(等韵图另在等韵学的研究那一部分再来分析)。明代开始,已有不少人将《广韵》按不同的方式加以分析、改编,而顾炎武研究上古音时也注意到对《广韵》等材料的研究与利用。但真正系统地分析、研究《广韵》的,却是清代中叶的学者陈澧。陈氏之前,如江永、戴震等人,已相当注意对中古韵书的研究,但他们还不是把《广韵》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重心。到了陈澧手中,他为了弄清《广韵》制作的条例,归纳反切的系统,了解隋唐时“撰韵之旧法”,对《广韵》全书进行分析、排比,用反切系联的方法归纳出《广韵》切语上下字的体系,分析出宋代以来流传的三十六字母的照组应分为两类,喻母也应分两个,提出反切上字应分四十类的结论,反切下字有三百类左右。他把此书定名为《切韵考》,表现了他企图从《广韵》的反切来了解《切韵》的语音系统的目的。陈氏的工作开了后代对韵书以至字书的反切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他开创的系联反切的方法,给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手段。但是,陈澧在运用这一方法上有不妥当的地方,对系联的正例与变例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表现了进退失据的弱点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因此,他的结论还不确切。后来的学者不少人对他的错误加以订正,对他的结论加以修改、补充。周祖谟先生写有《陈澧切韵考辨误》,曾运乾、陆志韦、黄淬伯、白涤洲、董同龢、李荣、方孝岳诸人对四十声类的提法都有修正。有的提出应分四十七类(黄淬伯、白涤洲),有的主张五十一类(曾运乾、陆志韦),有的说当有五十四类(董同龢),方孝岳先生则主张分为五十九类。韵类的分析各家也不很一致。总之,陈氏在运用论证方法上有它的局限性,但他的见识和首创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自陈澧的《切韵考》分析了《广韵》一书的反切之后,出现了许多分析韵书、字书反切系统的文章,较重要的有黄淬伯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严学窘先生的《大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张世禄先生的《朱翱反切声类考》,周法高的《玄应反切考》,白涤洲的《集韵声类考》等,这些论著对于丰富中古音的研究材料,都有重要的作用。

清代,由于《切韵》的残卷尚未发现,所以陈澧写《切韵考》的目的之一,就是企图通过《广韵》来考见《切韵》的面目。后来,《切韵》《唐韵》及其他韵书残卷陆续发现了,人们的研究领域扩大了,这时候便出现了许多研究《切韵》残卷及其他同一系统韵书的论文。主要有王国维、丁山、董作宾、刘盼遂、方国瑜、魏建功、姜亮夫、周祖谟、徐仁甫等人的文章。这方面,王国维、魏建功、姜亮夫、周祖谟等人的贡献比较大。

就《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来说,近几十年来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 对《切韵》系统体例方面的问题做了探讨,包括对《切韵》、《广韵》等书的韵例、韵目、韵数、韵序的研究和推阐。

2. 把《切韵》、《广韵》按另一种便于研究和使用的方(即服务于某种使用目的)加以重新编排,如刘复等人编《十韵汇编》,将传统所见和新发现的韵书资料对照排列,便于展示异同,了解各韵书列字的差别。又如沈兼士等人编《广韵声系》,则便于查考各字的谐声关系。丁声树、李荣编《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便于查见《广韵》中各个字的切语以及与现代读音的对照。赵元任编《方言调查字表》,便于利用《广韵》系统来调查方言,等等。

3. 对《切韵》、《广韵》系统的内部结构及某些音类的发音特点进行探讨,这方面又包含几个问题。

甲、考证某些声母的音值,这方面重要的文章有罗常培的《知彻澄娘音值考》和《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纽》,陆志韦的《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葛毅卿一些考证声类音值的文章(未刊),李新魁的《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等。

乙、论证韵类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论文有罗常培的《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他主张把高本汉拟为合口的鱼韵改为开口,并认为《切韵》中的鱼虞两韵在六朝的吴方言里面有-io、-iu 的区别,而在北方方言中都不存在这种区别。周法高的《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一文也研究了鱼虞两韵的音值,认为鱼韵读为 iō(o 是开 o),虞韵读 iwo(o 是关 o),与模韵相配的是虞而不是鱼。龙果夫的《古汉语构拟探索》则主张把高本汉用长短元音来区分重韵改为 a 与 o 的不同。葛毅卿的评高本汉对齐先萧青添及支仙宵清盐阳唐蒸登诸韵的韵值两篇文章,也提出与高本汉不同的拟音。邢公畹先生则写了《论中古汉语元音的长短》,马学良、罗季光先生写了《〈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都对《切韵》系统的元音提出了新的看法。

丙、研究《广韵》的重组问题。重组是《切韵》和《广韵》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语音现象。在同一个韵之内,即同韵、同声、同呼的字中,出现两个反切。这些反切,上字同为一套(同类),而反切下字却分为两套。中古的韵图把有重组的两套字分列于三等和四等地位。对这种有重组的韵部,陈澧作《切韵考》时已经发现,他也看出这是读音上不同,所以反切有两套。章炳麟、黄侃则以为不是表示语音的差别。高本汉在研究中古音时,以为《广韵》系统中的重组基本上同音,不过他以声母的“j 化”来加以区别,认为一类是 j 化音,一是非 j 化音。陆志韦写了《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一文,不同意高本汉看法,提出是介音长短的不同,他在《古音说略》中把一类字的介音拟为 I,一类拟为 i。李荣先生的《切韵音系》基本上也是从介音方